

# 肯尼斯·戴克与伊巴丹史学 流派的创立<sup>\*</sup>

李文刚

---

**【摘 要】**肯尼斯·戴克是尼日利亚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以及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作为第一位系统接受西方历史学专业训练的非洲人，戴克并没有受到西方中心主义史学理论的束缚，而是以强烈的非洲民族主义情怀，大力倡导从非洲视角以及非洲内在因素与英国殖民主义的互动角度去解读非洲的过去。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戴克既重视口述史料，亦强调依靠档案资料。20世纪60—70年代，在戴克的号召和领导下，以伊巴丹大学历史系为中心的尼日利亚史和非洲史研究蔚然成风，伊巴丹史学流派得以创立，这对非洲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伊巴丹史学流派因种种原因走向衰落，但戴克的贡献和该学派的历史遗产直到今天仍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关键词】**肯尼斯·戴克 伊巴丹史学流派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 尼日利亚史

**【作者简介】**李文刚，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 - 1125 (2023) 03 - 0094 - 15

---

作为尼日利亚第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人物，肯尼斯·翁乌卡·戴克 (Kenneth Onwuka Dike, 1917—1983年) 既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开拓者、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通史》(多卷本)”(LSYZD21022)的阶段性成果。

奠基人，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sup>①</sup> 专门研究伊博族（Igbo）历史文化的学者格洛里亚·楚库（Gloria Chuku）称：“戴克是现代非洲历史书写之父。”<sup>②</sup> 戴克虽不是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sup>③</sup> 但他的代表作《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1830—1885）：尼日利亚经济政治史导论》<sup>④</sup>（以下简称《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在非洲史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参与创立的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尼日利亚历史学会，以及在其号召和领导下形成的伊巴丹史学流派（Ibadan School of History），对尼日利亚史学乃至整个非洲历史研究的发展都功不可没。正是有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家的著述，<sup>⑤</sup> 非洲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对非洲的历史才有了更加客观、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尽管伊巴丹史学流派的创立并非戴克一人之功，也绝非朝夕之事，它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非洲国家独立后去殖民化以及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时代之问”的产物，但是戴克的不懈努力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内学界对戴克及伊巴丹史学流派的研究有所关注，<sup>⑥</sup> 但尚未有专文论及戴克作为一名系统接受西方历史学专业训练的非洲学者，是如何创立一个从非洲视角研究非洲历史的著名学派的。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戴克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贡献，特别是其创立伊巴丹史学流派的历程作较为细致的探讨，以期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为建构非洲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 
- ① 参见 J. D. Fage, Dike, Kenneth Onwuka (1917 - 1983), in Joseph C. Miller, ed., *New Encyclopedia of Africa*, Vol. 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8, p. 95.
- ② Gloria Chuku, Kenneth Dike: The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Gloria Chuku, ed., *The Igbo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37.
- ③ 除了代表作《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1830—1885）：尼日利亚经济政治史导论》，戴克还有其他两部篇幅不长的著作，即《英国在尼日利亚的百年统治：1851—1951》和《尼日尔传教团的缘起：1841—1891》。参见 K. Onwuka Dike, *100 Years of British Rule in Nigeria, 1851 - 1951*,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58; K. Onwuka Dike, *Origins of the Niger Mission, 1841 - 1891*,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62。
- ④ 参见 K. Onwuka Dike,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 - 188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Ni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 ⑤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其中第 6 卷主编阿贾伊（J. F. Ade Ajayi）就是伊巴丹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参见 [非洲] J. F. 阿德·阿贾伊编：《非洲通史》第 6 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张文淳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年版。
- ⑥ 参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 年第 1 期，第 127 ~ 140 页；张忠祥：《20 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31 ~ 39 页；曹峰毓、后黎：《论肯尼思·翁伍卡·迪凯在非洲史研究中的贡献》，《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145 ~ 156 页。

## 一、肯尼斯·戴克的生平和学术任职

1917年12月17日，戴克出生于尼日利亚东南部阿沃卡镇（Awka）一个伊博族游医和商人家庭，幼时父母双亡，由祖父恩万科·戴克（Nwancho Dike）和兄长乔治·戴克（George Dike）抚养成人。恩万科·戴克是尼日利亚东南部商业中心奥尼查（Onitsha）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当局的一名“委任酋长”（warrant chief）。<sup>①</sup>戴克6岁时便跟随一位游医学徒，穿梭于阿沃卡和奥尼查形形色色的祖先祭坛和市场。他还经常跟随祖父参加各类会议、节日庆典，听长者议论族内大事。可以说，戴克很早就接触了非洲口述史传统，因为从事非洲史研究的学者早已发现：“在非洲的口述群体中，许多具有历史特征的信息都嵌入在巫术仪式、节日、面具舞蹈、击鼓、雄辩言辞以及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和活动中。”<sup>②</sup>

起初，戴克在阿沃卡的政府学校上小学，其兄长乔治·戴克到瓦里（Warri）读师范后，戴克不得不寄居在奥波博（Opobo）和卡拉巴尔（Calabar）的亲戚和朋友家，转学到圣乔治小学和霍普·瓦戴尔学校。乔治·戴克毕业后，在伊博人的乌迪镇政府学校获得首份教职，随后便回到家乡任教。戴克也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回到兄长身边，进入阿沃卡政府学院学习。1933年，戴克转入奥尼查的名校邓尼斯纪念文法学校（Dennis Memorial Grammar School）学习。1936年12月，戴克从邓尼斯纪念文法学校毕业，成为阿巴（Aba）圣迈克英国圣公会的一名牧师。<sup>③</sup>

英国在尼日利亚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并不关心当地的高等教育发展。因此，不少有抱负的非洲青年不得不到异国他乡求学深造，戴克也不例外。由于戴克热心教会工作，尼日尔河三角洲牧师传教团（当时西非英国圣公会的一个分支）资助他到塞拉利昂的福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深造，但戴克要先到黄金海岸（今加纳）的阿奇莫塔学院（Achimota College）学习一

① 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殖民统治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依靠当地酋长为殖民当局服务，这在尼日利亚北部最为突出。在尼日利亚东部伊博人地区，因缺乏传统政治首领，“大酋长”并不存在，英国人就推出“委任酋长”（warrant chief），人为地给当地人制造酋长。尽管这些人的地位和权力得到英国人的承认和强化，但无法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② [尼日利亚] 埃比戈贝里·乔·阿拉戈：《非洲史学实践：非洲史学史》，郑晓霞、王勤、胡皎玮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③ 参见 Gloria Chuku, Kenneth Dike: The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Gloria Chuku, ed., *The Igbo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37 - 139。

年，以获得福拉湾学院要求的入学学分。1939年1月，戴克如愿进入福拉湾学院学习。福拉湾学院在当时隶属于英国的杜伦大学，并且可授予杜伦大学的学位，有“西非雅典”之称。<sup>①</sup>在福拉湾学院学习期间（1939—1944年），戴克获得了杜伦大学的英文、地理和拉丁文学士学位，还取得教育学文凭，这标志着他的职业身份实现了由牧师向教师的转变。<sup>②</sup>

1944年，戴克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奖学金的资助下，赴阿伯丁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1947年，戴克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阿伯丁大学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sup>③</sup>随即进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英帝国史大家文森特·哈罗（Vincent Harlow）和杰拉尔德·格雷厄姆（Gerald Graham）。<sup>④</sup>戴克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虽然受当时英国史学研究的主流趋势和导师的影响，戴克的论文选题并没有脱离英帝国史的范畴，但是戴克的叙事方式和书写中心发生了重要变化。戴克研究的中心不再是“威斯敏斯特，而是尼日尔河三角洲”，他对尼日利亚当地资料，特别是口述史料的运用，使得其研究受到极大好评。1950年7月28日，戴克获得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接受西方完整的历史学专业学术训练的非洲人。<sup>⑤</sup>

1950年9月，戴克学成归国，进入伊巴丹大学学院历史系工作，<sup>⑥</sup>成为该系首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历史教师。1951年，戴克转入伊巴丹大学学院西非社会经济研究所（后改称尼日利亚社会经济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1956年，戴克获得了几项不同寻常的“第一”：首位被聘为全职历史教授的非洲人；首位担任历史系主任的非洲人；首位担任大学学院（伊巴丹）院长的非洲人。当大学学院升级为伊巴丹大学后，戴克又成为大学的副校长（1962—1967年）。戴克的其他学术任职包括：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首任馆

① 参见 Daniel J. Paracka, Jr., *The Athens of West Africa: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t Fourah Bay College, Freetown, Sierra Leon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71。

② 参见 Gloria Chuku, Kenneth Dike: *The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Gloria Chuku, ed., *The Igbo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38。

③ 参见 Ebere Nwaubani, Kenneth Onwuka Dike, *Trade and Politic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African in History*, *History in Africa*, Vol. 27, 2000, p. 229。

④ 参见 K. Onwuka Dike,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 - 188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Ni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vi。

⑤ 参见 P. D. Curtin, *Recent Trends i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History in General*, in J. Ki-Zerbo, ed.,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1, Methodology and African Pre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 64。

⑥ 伊巴丹大学学院成立于1948年，隶属于英国伦敦大学，是尼日利亚的第一所大学。1962年，大学学院升级为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 of Ibadan, UI）。

长（1952—1954年）、尼日利亚历史学会首任会长（1955—1969年）、国际非洲研究者大会第一任主席（1962年）、英联邦大学联合会主席（1965—1966年）等。

1966年，独立不久的尼日利亚即爆发军事政变和内战，史称比夫拉战争（The Biafra War）。<sup>①</sup>戴克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信心遭受重挫，迫不得已离开伊巴丹大学，返回故乡伊博地区，支持比夫拉共和国。尼日利亚内战以联邦军政府的胜利而告终，戴克于战后前往美国，任哈佛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1970—1980年），后回国担任家乡阿南布拉州技术大学（今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的校长（1980—1983年）。1983年，戴克在尼日利亚埃努古大学教学医院病故。

## 二、肯尼斯·戴克的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戴克关注的主要问题同泛非主义者是一样的，即高扬非洲荣耀、维护非洲利益。<sup>②</sup>戴克对非洲传统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坚定捍卫非洲历史和文化，并为之正名。<sup>③</sup>二战后，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非洲民族主义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但殖民当局及其御用文人仍试图逆历史潮流而动。英国历史学家玛格丽·佩勒姆（Margery Perham）<sup>④</sup>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在20世纪50—60年代以支持英国非殖民化政策而闻名。<sup>⑤</sup>1951年7月，佩勒姆在《外交事务》杂志刊发题为《英国在非洲的问题》的文章，<sup>⑥</sup>反对给予西非人民，特别是黄金海岸人（今加纳人）建立自治政府

① 比夫拉战争（1967—1970年），系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同东部伊博人分离势力建立的比夫拉共和国（因比夫拉湾而得名）之间的战争。战争起因既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也有伊博人同豪萨人之间的民族宗教文化矛盾，其中对石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是关键。内战以联邦军政府一方获胜结束，在军政府的大赦和民族和解政策下，伊博人重新接受尼日利亚人的身份，并认定尼日利亚作为自己所属国家的合法性。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伊博人以遭受边缘化为由谋求恢复比夫拉共和国。

② 参见 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 226。

③ 参见 Gloria Chuku, Kenneth Dike: The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Gloria Chuku, ed., *The Igbo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45。

④ 玛格丽·佩勒姆（1895—1982），英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非洲问题，曾任英国非洲研究协会首任会长。

⑤ 参见 Kenneth O. Morgan, Imperialists at Bay: British Labour and Decolonizatio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27 (2), 1999, p. 239。

⑥ 参见 Margery Perham, The British Problem in Af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29 (4), 1951, pp. 637 - 650。

(self-government) 的权利，理由是“非洲人原始、技术落后、能力低下，以及准备不足”。<sup>①</sup> 对这一充斥着欧洲中心论和优越论、对西非人民极具侮辱性的评语，戴克奋起反击，他于 1953 年 2 月至 3 月在《西非》(West Africa) 杂志上连续刊发题为《非洲历史与自治政府》的文章，引发国际关注。有意思的是，由于当时佩勒姆在殖民政治和政策研究方面堪称权威，在反击佩勒姆之前，戴克听从了《西非》杂志编辑大卫·威廉姆斯 (David Williams) 的建议，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亲自从伦敦到牛津拜访了佩勒姆。但当佩勒姆读了戴克的文章后，她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篇好文章。<sup>②</sup> 戴克认为，各民族皆有其文化和历史，凡是让一个民族充满活力的东西，皆可定义为文化，诸如法律、习俗、传统、音乐、艺术、礼仪、信仰、服饰。这些东西在非洲不但不缺乏，而且是绚烂多彩的，它们是建立自治政府的根基。<sup>③</sup> 戴克的系列文章立即引起巨大反响，他也因此被视作非洲知识分子中的英雄、非洲民族主义者和泛非主义者。

戴克既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又能够及时捕捉反殖民主义及民族独立运动的时代主题。更可贵的是，他还认识到了非洲历史对新生的非洲国家的重要性。他所要做的，就是要用非洲人心目中的非洲史，纠正长期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对非洲人、非洲文化和非洲文明的错误解读。戴克坚决捍卫非洲历史和文化，大声疾呼加强非洲历史研究，对鼓舞和支持非洲人民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事实上，在英国留学期间，戴克就经常参加西非学生会 (West African Students Union, WASU)<sup>④</sup> 的活动，他回国后虽没有公开参与尼日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但本国的政治家和民族主义领导人都积极征求他的意见。戴克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尼日利亚和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戴克的另一个重要学术贡献是倡导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他也因此被视为非洲现代史学的先驱。欧洲中心主义史学流派的观点是，没有文字记载，就

① Gloria Chuku, Kenneth Dike: The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Gloria Chuku ed., *The Igbo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45.

② 参见 K. Onwuka Dike, African History Twenty Five Years Ago and Today,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Vol. 10 (3), 1980, pp. 15 - 16.

③ 参见 Gloria Chuku, Kenneth Dike: The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Gloria Chuku, ed., *The Igbo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45 - 146.

④ 西非学生会系 20 世纪 20 年代在英国伦敦成立的西非各殖民地国家的留学生组织，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非洲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不少成员后来都成为各自国家独立运动的领导人。

没有历史——非洲没有书写文字，因而也就没有历史。但戴克认为，人们不应仅仅依赖书面文献来研究历史，诸如口述资料等都是人类记录历史的载体。只要口述资料能够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并且研究者在鉴别和使用资料时保持谨慎的态度，抛弃口述资料就是毫无道理的。戴克对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便体现在其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视上。<sup>①</sup> 在戴克看来，历史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除了文献资料，还要依靠口述资料、语言文化资料、考古资料等。戴克的这些思想在其代表作《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中得到了集中展现。

从该书的参考文献来看，戴克主要运用了两类资料，即英国资料和非洲本土资料。前者主要是档案资料，包括英国外交部档案、行政信函、议会文件、领事信函、法庭文件以及一系列机密报告等，此外还包括私人手中的各种家庭资料。非洲本土资料主要是口述资料和一些实地考察获取的资料。<sup>②</sup> 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戴克多次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做田野考察，他还到民间调研访问，以获取一手资料。戴克对口述资料高度重视，以至于学界认为他有过分重视口述史而忽视文献资料之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口述传统是非洲史学最基本的传统，戴克的贡献在于使“口述传统从此不再被单纯地视为民谣，而被承认为历史研究的合法史料”。<sup>③</sup> 如果说戴克只重视口述资料，那也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极力要创建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当代非洲历史研究的重要学者托因·法罗拉（Toyin Falola）指出：“如果没有国家档案馆，尼日利亚史学研究的学术产出将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sup>④</sup>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戴克对跨大西洋贸易以及废奴运动所持的观点。择其要而言之：其一，欧洲通过奴隶劳工积累的资本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二，在废除奴隶贸易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经济因素，而不是基督教福音派和人道主义因素；其三，奴隶贸易的废除彻底改变了英国与尼日利亚的关系，加速了英国对尼日利亚的直接控制和尼日

① 参见 Gloria Chuku, Kenneth Dike: *The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Gloria Chuku, ed., *The Igbo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46 - 147.

② 参见 K. Onwuka Dike,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 - 188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Ni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224 - 230.

③ 张忠祥：《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第37页。

④ 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 27.

利亚沦为完全殖民地的进程。从国内外学术界对废奴运动的研究来看，<sup>①</sup> 戴克的上述观点均具有非常明显的进步意义。

有学者指出，戴克著作最大的缺陷在于他对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本身历史的建构。戴克认为，15世纪葡萄牙人来到西非海岸时，当地实际上是无人居的。但后来的语言学和口述史研究成果表明，早在15世纪前，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就有居民在那里世代繁衍生息，而且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三角洲地区的居民与内陆民族的贸易就非常活跃。<sup>②</sup> 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研究条件，戴克著作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法罗拉所言，在评价20世纪50年代的戴克和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其他学者的著作时，不能仅仅按照学术标准，还应考虑这些著作具有的重大象征意义：非洲人有能力用学术语言就自身民族的历史进行原创性研究，并著书立说，令世界各地的同行领略其风采。<sup>③</sup>

### 三、伊巴丹史学流派的创立及影响

1950年回国后，戴克担任伊巴丹大学学院历史系教授。戴克强调要从非洲视角以及非洲内在因素与英国殖民主义的互动角度来解读非洲历史，而不是仅仅将之视作英殖民帝国史的一部分。起初，戴克在历史系的影响并不大。首任系主任波特（C. J. Potter）虽然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并且权力很大，但他既没有受过专门的非洲史教育，也没有引进人才发展非洲史学的意愿，而更热衷于神学和行政事务。其他教师如琼·科普兰（Jean Copeland）、伊夫林·马丁（Evelyn C. Martin）等，研究兴趣则多为欧美史、英帝国史。伊巴丹大学学院被英国教员控制，只能照搬伦敦大学的课程和教学体系，学术研究缺乏自由和独立性。如果说有什么与非洲相关的课程的话，那就是“14世纪中叶至今欧洲人在非洲的活动史”，<sup>④</sup> 亦即欧洲对非洲的殖民扩张史。可以说，戴克与他的同事们志不同、道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壮志满怀的戴克是难以施展才华的，他不得已从历史系辞职。

1952年，戴克转入伊巴丹大学学院的西非社会经济研究所，得以接触

<sup>①</sup> 参见李安山：《非洲现代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2页。

<sup>②</sup> 参见Ebere Nwaubani, Kenneth Onuwuka Dike, Trade and Politic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African in History, *History in Africa*, Vol. 27, 2000, p. 234。

<sup>③</sup> 参见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 228。

<sup>④</sup> 参见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 227。

大量文献，同时也获得了更大的学术自由度，从此他开始潜心于学术创新。在殖民统治时期，英国虽然也做了一些档案保存的工作，但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统治的便利，并没有意识到殖民文献也是殖民地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并不会精心去做档案整理工作。直到1948年，伦敦公共档案馆才提出要帮助尼日利亚建立自己的档案馆。由于戴克提出的建馆方案成本较低，不需要伦敦方面的资助，并且他本人又是伦敦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查阅过一些殖民政府文件，对这些资料的状况较为了解，故英国殖民政府同意由戴克负责此事。<sup>①</sup> 1953年6月，戴克提交了题为《历史档案保护与管理及在尼日利亚建立公共档案馆》的报告。<sup>②</sup> 1954年4月，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正式成立，之后分别在殖民时期的三大行政中心伊巴丹（1957年）、埃努古（1962年）以及卡杜纳（1963年）建立了分馆。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政府文件、私人信函、贸易公司和传教士资料，以及殖民地时期的报纸和杂志，并做了条目索引，既给史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开阔了学者们的视野。可以说，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的创建奠定了尼日利亚现代史学研究的基础，戴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戴克返回伊巴丹大学学院历史系并担任系主任，迈出了伊巴丹史学流派创立道路上的关键一步，因为他从此拥有了实施其学术规划的权力。戴克成为伊巴丹大学的第一位本土副校长后，更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历史学与民族国家建构以及民主主义的关联上。随着尼日利亚独立步伐的加快，伊巴丹大学学院历史系引进了一批对非洲史和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感兴趣的海归博士，如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专门研究约鲁巴族历史的萨布里·比奥巴库（Saburi Biobaku），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这些学者采用非洲视角研究非洲的过去，强调非洲口述史的重要性，他们向外界证明，建立非洲史学科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大有可为的。

1955年，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成立，戴克任创始会长。1956年，《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创刊。此后，戴克与伊巴丹大学其他学者发起了一项旨在探索非洲过去的历史研究计划。1965年，戴克主持的“伊巴丹历史系列”（Ibadan History Series）丛书开始出版。在丛书“导言”中，戴克明确提出要继承非洲古代的史学传统，将口述史和跨学科视野引入非洲史研究。“伊

① 参见 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p. 29–30。

② 参见 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 30。

巴丹历史学派”的名称也出现在丛书“导言”中,<sup>①</sup>是为伊巴丹史学流派正式创立的标志。当时伊巴丹大学历史系汇聚了一批尼日利亚历史学家,如萨布里·比奥巴库、阿德·阿贾伊(J. F. Ade Ajayi)、阿迪埃尔·阿非博(Adiele Afigbo)、特克纳·塔穆罗(Tekena N. Tamuno)、阿严德勒(E. A. Ayandele)等。一些外国学者,如迈克尔·克劳德(Michael Crowder)、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也同伊巴丹史学流派联系紧密。伊巴丹史学流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西方传教活动,伊博、约鲁巴、豪萨等族的王国历史及其对殖民主义入侵的反抗,以及英国殖民统治对尼日利亚社会的影响等,总体以尼日利亚为中心,也涉及非洲其他国别和地区的历史。<sup>②</sup>

为了进一步阐发伊巴丹史学流派的丰富内涵,此处对除戴克以外的其他代表性史家的学术成果和地位再略作介绍。

比奥巴库的著作《伊格巴及其邻邦:1842—1872》,<sup>③</sup>是继戴克的著作之后,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部尼日利亚人撰写的历史著作。比奥巴库主要关注约鲁巴族的起源及伊格巴王国的发源地问题,其选题和研究方法与戴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使用口头传说方面比戴克更为大胆。<sup>④</sup>1953年,比奥巴库进入伊巴丹大学学院工作,成为第一位非洲本土教务长,这一身份对推动伊巴丹大学学院的非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⑤</sup>此外,比奥巴库还主持西区(western region)政府资助项目“约鲁巴族历史研究计划”,广邀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领域人才,共同探究约鲁巴族的起源问题。

① 参见李安山:《非洲现代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5页。

② “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主要包括以下著作,参见J. F. Ade Ajayi, *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 - 1891: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 London: Longmans, 1965; E. A. Ayandele, *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Modern Nigeria, 1842 - 1914: A 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 London: Longmans, 1966; Murray Last, *The Sokoto Caliphate*,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7; Obaro Ikime, *Niger Delta Rivalry: Itsekiri-Urhobo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s Presence, 1884 - 1936*,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9; R. A. Adeleye, *Power and Diplomacy in Northern Nigeria, 1804 - 1906: The Sokoto Caliphate and its Enemies*, London: Longmans, 1971; A. E. Afigbo, *The Warrant Chiefs: Indirect Rule in Southeastern Nigeria, 1891 - 1929*, London: Longmans, 1972; T. N. Tamuno, *The Evolution of the Nigerian State: The Southern Phase, 1898 - 1914*,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2。

③ 参见Saburi O. Biobaku, *The Egba and Their Neighbours, 1842 - 187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④ 参见李安山:《非洲现代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4页。

⑤ 参见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 228。

阿贾伊将口述传统和口述史视为重建非洲社会的重要依托，在发展以非洲为中心的史学方面做出了世所公认的贡献。<sup>①</sup>阿贾伊的研究领域包括基督教传教团史、约鲁巴族史以及殖民主义对非洲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影响等。阿贾伊开创了对基督教传教团的研究，他的专著《尼日利亚基督教传教团（1841—1891）：新精英的形成》是“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中的第一部。<sup>②</sup>阿贾伊认为，虽然基督教传教活动往往伴随着殖民侵略，但客观上对非洲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殖民主义只是非洲历史的一个插曲，并未中断非洲人自身历史的延续，非洲人仍掌握着自己的命运。非洲国家应团结起来，在泛非主义旗帜的指引下应对殖民主义。<sup>③</sup>

阿非博是伊巴丹史学流派的一位承上启下的史学家。得益于戴克设立的研究生院，阿非博是伊巴丹大学历史系自己培养的博士，也是尼日利亚本土大学培养的第一位博士。阿非博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伊博族史、殖民统治史、族际关系史、奴隶贸易史以及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等。<sup>④</sup>阿非博的著述还涉及尼日利亚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如欠发达、种族主义、腐败等，他将其根源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开始。阿非博认为，尼日利亚的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学术上都严重依赖欧美国家，但欧美模式只适应欧美国家的状况，并不一定能满足尼日利亚民众的需要。历史学家要通过对前殖民时期历史的分析，让尼日利亚的统治精英从他们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中汲取价值和活力，发现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从而提升尼日利亚在国际学术圈中的地位。阿非博还希望，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的一些优秀传统，也可以为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对话做出贡献，为非洲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sup>⑤</sup>

塔穆罗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尼日利亚的政治演化、基础设施发展、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治理、和平与冲突解决等。塔穆罗还是尼日利亚最杰出的公众历史学家（public historian），他面向尼日利亚普通民众写作，题材均是全

① 参见 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 116。

② 参见 J. F. Ade Ajayi, *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 - 1891: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 London: Longmans, 1965。

③ 参见石海龙、张忠祥：《阿德·阿贾伊与非洲史研究》，《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第100~102页。

④ 阿非博出版著作（包括合著）8部，主编著作4部，发表的学术论文超过100篇，担任多种著名刊物的编委，如《非洲历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非洲历史》（*History in Africa*）。

⑤ 参见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Heaton, *The Works of A. E. Afigbo on Nigeria: An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History in Africa*, Vol. 33, 2006, pp. 156 - 157。

国关心的话题。<sup>①</sup>

阿严德勒反对伊巴丹史学流派过分强调政治史，对其将帝王将相 (kings and elites) 视作历史重建的主体而无视其他人的现象提出批评。在他的影响下，伊巴丹史学流派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社会史和经济史。20 世纪 80 年代，伊巴丹史学流派进一步开辟和扩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将尼日利亚现代史和国际关系研究也纳入其中，更加全面深入地推动了尼日利亚和非洲史学的发展。<sup>②</sup>

“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尼日利亚和非洲，还深入整个国际学术界，堪称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一座丰碑。法罗拉认为，“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的突出贡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它通过研究和赞美非洲的伟大文明（如加纳、马里、桑海、大津巴布韦等），证明在与欧洲人接触前，非洲就有灿烂而辉煌的历史；其二，它批驳了充斥于“殖民图书馆” (colonial library) 的非洲历史是欧洲人在非洲的历史的荒谬观点；其三，它在历史书写中增加了非洲维度和非洲因素；其四，它证明非洲人有能力进行民族国家建构和统治。<sup>③</sup>正是由于顺应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伊巴丹史学流派才在非洲民族主义史学中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事实上，伊巴丹史学流派的影响不仅在于其原创性学术成就，而且体现在为尼日利亚培养了一批中学历史教师。20 世纪 70 年代，受伊巴丹史学流派的影响，西非考试委员会发布了新的非洲历史教学大纲。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下，伊巴丹学派的学者经常为整个西非的教师举办研讨班，他们还撰写了非洲历史的教科书，如《西非历史一千年》、《19、20 世纪的非洲》以及《非洲文明的发展》等。<sup>④</sup>这些教科书清晰反映了伊巴丹学派以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研究为中心的定位，即强调非洲人的历史成就，并注重培养非洲人理解自身处境以及主动采取应变措施的能力。

20 世纪 80 年代，阿贾伊和克劳德合著的两卷本《西非史》<sup>⑤</sup> 以及联合

① 参见 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p. 184 - 199。

② 参见 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p. 236。

③ 参见 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p. 233 - 234。

④ 参见 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 231。

⑤ 参见 J. F. Ade Ajayi and Michael Crowder, eds.,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Vol. 1, 1971; Vol. 2, 1974。

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都代表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此外，值得称道的是，伊巴丹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项目培养了众多杰出的历史学者，不但为尼日利亚各地高校提供了优秀的师资力量，而且其中一些移居国外的学者还成为非洲其他国家大学历史系的骨干乃至创始人。如奥默·库珀（Omer-Cooper）成为赞比亚大学历史系第一任系主任，贝丁·韦斯伯（Bertin Wesber）曾任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历史系主任，他们也将伊巴丹史学流派的传统和使命带到了非洲其他地区。

伊巴丹史学流派作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其历史功绩有目共睹。但作为一个新兴的史学流派，它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其自身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李安山教授指出，伊巴丹史学流派的研究选题集中在政治史而忽略社会经济史，导致其强调英雄史而忽视人民史，强调沿海地区而忽略内陆地区，强调大的王国而忽略小的酋邦。此外，研究方法不够多样化也是其弱点之一。<sup>①</sup>考虑到戴克等人受英国史学传统的影响以及当时非洲文化去殖民化，特别是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上述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伊巴丹史学流派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总结自身的优劣。例如，1980年，戴克在庆祝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成立25周年的主旨讲话中呼吁，非洲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要更加开阔，不仅要研究撒哈拉以南地区相对较少的大帝国和大王国，而且要深入研究小规模的人群和国家，因为他们才是非洲的主体。非洲国家还应加大投入，培养大批掌握社会科学研究手段和技巧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上，戴克指出：“随着历史学家转向社会科学寻求新的见解以及模型和方法，历史学开始从编年史转变为关注人类社会变化的社会科学。‘新史学’试图将自身从文献和文献施加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它向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敞开了大门，如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并乐于接受所有的人类创制，包括语言、艺术、口头传统、村落遗迹、土地制度，以及学者可用的其他所有资源。”<sup>②</sup>

20世纪70—80年代，受内战、军人长期执政和经济状况恶化的影响，尼日利亚整个国家陷入危机，严重影响了本土的知识生产，包括历史学的发展。国家档案馆年久失修，缺乏必备的空调、发电机、微缩设备，专业人员更是短缺。1984年，国家档案馆启动的口述史项目也因经费被削减而不了

① 参见李安山：《非洲现代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5~107页。

② K. Onwuka Dike, African History Twenty Five Years Ago and Today,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Vol. 10 (3), 1980, p. 17.

了之。<sup>①</sup> 大学教学、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教师工资经常被拖欠，不少学者移居海外。更为不利的是，尼日利亚政府认为，历史研究并不能给国家带来“真金白银”的财政收入，因而对史学研究并不重视。这与尼日利亚独立初期的情况大相径庭——当时正是在联邦政府和区政府的支持下，尼日利亚史学才有了显著的发展。1999年，尼日利亚在经历了长期的军人执政后成功实现“还政于民”，民主成为热门话题。尼日利亚的政策制定者们认为，民主价值观的发展体现在民众的充分觉醒上，这一点通过遍布全国各地的广播站就可以实现，而无须提高民众的历史意识。<sup>②</sup> 在这样的背景下，盛极一时的伊巴丹史学流派逐渐衰落了，《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也基本停刊，不禁令人扼腕叹息。事实上，尼日利亚民主政治确立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是民族国家建构，伊巴丹史学流派的创立也正是基于这一时代主题。进一步而言，戴克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召下推动建立的一系列机构，至今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仍具有重要意义。<sup>③</sup> 2016年，戴克的长子在接受尼日利亚《抨击报》（*Punch*）采访时表示，戴克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尼日利亚人似乎没有从比夫拉战争中汲取历史教训，尼日利亚的民族国家建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sup>④</sup> 以史为鉴是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之一，对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化进程命运多舛、一波三折的尼日利亚来说，唤醒民众的历史意识、汲取历史教训依然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值得庆幸的是，一方面，在尼日利亚国内历史学界，有以曾任伊巴丹大学副校长的埃比戈贝里·乔·阿拉戈（Ebiegberi Joe Alagoa）等为代表的学者继续耕耘；另一方面，在美国的非洲史学界，伊巴丹史学流派培养的学者如约瑟夫·伊尼科里（Joseph Inikori）和法罗拉等亦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使伊巴丹学派的史学传统得以赅续。<sup>⑤</sup> 当前，殖民史学在非洲卷土重来，<sup>⑥</sup> 非洲历史的去殖民化仍旧任重道远。因此，以倡导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摆脱

① 参见 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 36。

② 参见 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p. 35–36。

③ 参见 Gloria Chuku, Kenneth Dike: The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Gloria Chuku, ed., *The Igbo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37。

④ 参见 Taiwo Ojoye, Dad Was Disappointed That Despite Lessons from Civil War, Nigeria Still Divided—Kenneth Dike's Son, *Punch*, <https://punchng.com/dad-disappointed-despite-lessons-civil-war-nigeria-still-divided-kenneth-dikes-son/>, 2022年3月13日。

⑤ 这一观点的提出得益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李安山的指导，谨致谢忱。

⑥ 参见毕健康：《殖民史学在非洲卷土重来》，《历史评论》2021年第6期，第64~69页。

西方束缚为己任的伊巴丹史学流派，在今日仍有其存在的重要现实意义，它的兴衰成败亦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 四、结语

戴克一生先后经历殖民者对非洲的统治，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及非洲民族国家建构和去殖民化的进程。作为一个从小学起就系统接受西式教育的非洲人，戴克在面临究竟是继承西方学术传统，还是另辟蹊径的重要人生选择时，毅然选择了后者。他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非洲人的视角将文章写在了尼日利亚乃至整个非洲的大地上，开启了非洲学者以非洲为中心研究、书写、讲授和普及非洲历史的大幕。戴克对尼日利亚史和非洲史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其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更重要的是，通过坚守和引领，他还创立了名噪一时的伊巴丹史学流派，成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代表。

伊巴丹史学流派的发展历程也给我们建构非洲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提供了一些启示和借鉴。其一，任何有影响、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和知识生产，一定要适应时代主题，能够回答时代之问。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应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进建构更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其二，要有一批眼光长远、具备号召力的学者发挥引领作用，明确奋斗目标并为之追求不懈。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发展到今天，是四代学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即便是其中已届耄耋之年的老前辈，也不忘推进非洲史研究发展的初心，不愧为学界楷模。中国非洲史研究的人才培养亦初见成效，越来越多中国、非洲和欧美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为中国的非洲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三，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如伊巴丹史学流派便有自己的学会、刊物和系列丛书），不断举行各类学术活动，持续推出高质量的系列学术成果。目前国内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如中国非洲历史研究会，学术刊物如《西亚非洲》《中国非洲学刊》等，一直在为推动中国的非洲研究砥砺前行。在世界范围内，亦不乏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有关非洲研究的论文，或在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出版学术专著，《中国非洲学刊》更是同时推出中文、英文和法文三种版本。可以说，中国学者建构非洲研究“中国学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应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通史》（多卷本）”立项为契机，推动非洲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不断取得进步。

（责任编辑：张梦晗）